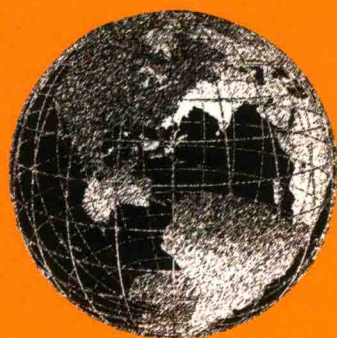


刘云柏◎著



#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云柏◎著

#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刘云柏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914-4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管理学-哲学 IV. ①C9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3129 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刘华鱼

封面设计 小 新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

刘云柏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2 插页 4 字数 759,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914-4/B·1311

定价 138.00 元

# 序

管理哲学与其他人类精神现象一样,它有着自己的理性机理和思辨轨迹,一方面勾勒出人性认知的先验诉求和彼岸性意蕴的观照和省悟,凸显了人类理性思辨的内在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管理的理性进路、精神意境、理想愿景、信仰诠释的蜕变和更迭,而不断发生整体性的嬗变和革新。因此,从人类认知的广义视角解读和诠释,管理哲学是人类最富有价值意境、人文理想、伦理精神、心智灵性、审美取向、终极图景的一种思辨机制和理性路径。如果说人类管理精神世界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管理哲学以及各种学术形态便是缀满枝头的奇花异果,为人类管理理性思辨增添斑斓的色彩和浓厚的芳香,也为人类管理精神学术园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管理哲学对人类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有着深层的导向作用,人的信念、信仰、理想在人类管理精神世界中总是像“坐标”、“天平”和“尺子”一样,随时都起着判断、调整、嬗递、支持和协同的作用,确定人类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的取向、进路和方式。在管理世界中,每个人总是按照自己认定的管理哲学的价值图景和认知理路去思考其与管理世界的关系,以实现其预定的决策、计划和目标。同时,每个企业乃至国家、民族、地缘均有自己的管理哲学倾向,这种倾向均凸显了它们所特有的管理理性思辨的价值路径和认知走向,这是它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中枢维度,也是它们整体思考、决策的终极动机和目的所在。尤其在今天,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步伐加快,人类共同享有的管理价值的理路和图景正在形成,不同企业乃至国家、民族、地缘的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尽管有着其特殊的规定性,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那种被人类共同认同的一般管理哲学所制约。可以预见,管理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是人类管理精神世界进入共同价值认知过程具有最为核心和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类管理未来的命运和前途。

在现今人类文明样式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影响人类管理认知品质优劣之因素,取决于其管理哲学思辨指向的先进与守旧程度。所谓管理哲学思辨指向系指人类通过其先验认知和彼岸性意蕴,在其精神世界构建人性意境、人本理想、普遍信仰的理性自觉。如果说管理技术作为一种主体行为是与作

为人类的对象性自然物相关的,带有明显的占有、侵蚀和主宰的动因及后果,那么,管理哲学是追问人的精神意境和终极关怀对人类认知价值取向探索中产生的。它尽管有着人类悠久的历史文明的沉积和传承,也曾就人类管理理性思辨的一般意义出现阐述、歧义和争论,却无法脱颖而出,自成一体。其结果均是零星的、残缺的和断裂的,其大多数只是夹杂、依附于当时各种管理思想或学派体系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人类工业文明的晚近时期。由于这个时期人类工业化过于烂熟而陷于“全球困境”之中,以竞争对抗和利益博弈为主要认知进路的管理思想体系已凸显出其学术机理上的贫困和窘迫,已根本无法阻挡、改变其日益衰落的趋势。于是,这引发了管理学界某种变革的诉求,并转而对管理哲学极大的关切和重视,企图从更高的管理理性思辨认知上寻找解决其危机和困境的理路及方案。诚然,在这种意境下对管理哲学的诠释和解读往往是比较宽泛的,不严格也不确定的,无益于人本主义逻辑体系的建设,只是仅局限或停留在将人类管理的方法、模型、公式、标准和工具,羁押于理性思辨中进行浸润和渗透,从而分离出一般性的特质和要素,旨在通过一定哲学语境来表述和显现;或者通过某种哲学理论和学说,对人类管理过程中有关价值进路、组织理性、行为方式、工具认知等方面进行形而上的诠释和证明。至今,这两种学术倾向一度成为工业化价值精神历史图景中的经典思辨范式,以及自我救赎路径,弥漫、占据于整个管理学界。

但是,综观其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它所描绘的“海市蜃楼”式的理性图式,却显得虚伪和模糊,而永远无法落地。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管理思辨未能从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存过程这个中枢维度入手,围绕人的自由创造和自我约束,共同价值和善的意义在科技高速发展中的能动性进行理性的阐明,也无法把管理看作是综合各种条件与关系的全部多样性于自身的、一定的具体历史的整体及其规范的管理理性认知,和以外在管理世界、他人和自己内在心境各种意识(先验认知、彼岸性意蕴的省悟、心智情绪、非理性直觉、理性精神及思辨)的统一体。因此,就不可能揭示管理哲学的本质与人类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的全部内在联系,明确人的人本精神对整个管理世界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地位,因而也就难免会流入国家意识形态复述中。

诚然,在人类精神现象史中,管理哲学图式是具象和鲜活的。而每一种管理哲学图式总是反映、展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的人类认知准则、思辨取向、精神意义和终极求索。尤其是在工业化价值精神的历史图景,以及其多元竞争格局中,管理哲学时常被分蘖为多样性的学术形态,蕴含着人类对于人性诠释和文明解读的不同理路及轨迹,当它们一旦各自生成和展开,便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坚韧性,并会侵入、渗透于人类认知中,使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而,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的各种管理哲学图式的认知边界、利益、进路、意义诠释和价值意境显

得如此的偏执和狭隘,乃至与国家意志及其意识形态相合一成为其主要属性特征。

如上所述,管理哲学是人类管理过程中思辨认知和理性精神的涅槃、蜕化、嬗变、更始和升华的结晶。由于人类最初工业文明意志同自身固有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浑然一体的必然性,经典论述中的管理哲学尽管采用了革命认识形态,或“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价值视野,注重从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或“人性原罪”出发,寻求和确定管理哲学的最初的学术机理,以及由此来勾勒人在管理中那种固定的制度意识和组织理性,却忽视了人与“社会关系总和”的变异、错位、失衡和蜕化,以及“上帝死了”的情景。因而,人类不可能沿着原先的那种管理哲学思辨的价值轨迹来维系、支撑其生命意义和文明进程。在经历工业化价值精神劫难以后,基于人类管理精神的严重扭曲和萎缩,普遍呈现出的沮丧、厌恶、疲倦的倾向,人类强烈地要求摆脱以往那种强制性的哲学思辨架构,形成正义、平等、和谐、富有人文终极关怀和“天人合一”精神氛围的机理维度,并转入对整个人类文明认知以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理性批判的研究,出现了在新的文明样式中管理哲学学术思辨的涅槃、复兴、变革的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悟性。

人类正处于其管理哲学思辨及其认知深刻变革的时代。过去人类论及的管理思辨理性图式,大都是在价值进路上困囿于主宰世界,以及人内在人性认知的自我控制和改造,人类为这种人与管理世界的哲学信念和愿景所付出的代价是惨不忍睹的,人本主义的缺失、普遍伦理的断裂、物欲消费主义的横流,解构着人的心境认知和道德守持,整个工业文明的终极图景是人性“恶”的极致扩张。人类尽管表面上有其高贵的生存方式,但是其灵魂早已沦入无限欲望诉求的黑暗之中。人类孕育、发轫“新人文主义”复兴的诉求,显而易见,新人文主义复兴诉求是当代人类精神世界涅槃、蜕化、嬗变的最高意境和理路。其最终目的是启蒙、维系人类先验认知和彼岸性意蕴,构建符合人类本性的认知进路,打碎工业化极端私利的价值模式及其消费主义拜物教的精神枷锁,净化、恢复被人类一度破坏的全球生存环境,重新评估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意义,创造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谐的人文氛围,人的全面发展的管理空间,以形成人性善治的人与管理世界的关系。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在这一人类管理思辨价值意境空前复杂的历史转折中,要求与之相适应具有高尚伦理精神和美学学术含量的先进的一般管理哲学学理体系的建立。

拙著《中国管理哲学》和《人类一般管理哲学》是根据管理哲学学科的理路时空、学科分支、逻辑关联和架构体系进行构思和撰写的。其主要内容和理路是从中国儒家管理哲学语境和意蕴出发,以人性善治为中枢维度和机理进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信道德恒常,推崇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则,提倡天人合一,信

奉众生平等,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文化的延续。以此价值取向为基础,中国管理哲学的人文关怀、伦理认知、审美意识、心理轨迹、社会意境、全球正义、终极诉求,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显而易见,中国管理哲学儒家学说具有独立性和融通性,对内聚合道德,对外吸纳文明,以主动积极地参与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构建,并从中获得新的精神生命。“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在于融合和创新,即继承传统、改革维新、倡导大同、认同普遍意义的思辨精神。

在更广义的学术向度上,将中国儒家管理哲学上升到人类管理普遍图景与“管理哲学”一般的高度,这里包括:人类一般管理哲学基本原理、范畴,以及与非普遍价值思潮的批判;主体理性思辨的中枢维度和内在机理;在意识形态张力上的争论与交锋;人类认知的困顿、失足的深层原因;人与自然、经济与企业;民族、国家与公共管理;地缘组织范式;全球化与全球管理;人在宇空中的管理理性守望;学术构建的路径、方向、方式、机制、目标、终极意义和主体责任,等等。其整体研究和论述凸显着以下内容:人的先验认知及其彼岸性意蕴;理性思辨的张力及其弱点;思想、理论与学术体系的巨大支撑意义及其不完善性;各管理学派之间的争鸣、交融、比较、冲突,以及各自的涅槃、蜕变、更始、兴衰和进退;管理意识形态、国家意志权力的历史过程和变异路径;人类文明进程与一般管理哲学的关联及影响,等等。总之,在梳理、剖析、诠释上述一系列命题内容中,将涉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其发展道路、终极轨迹、危机困境、出路前景又是什么,这些在人类生命意义和生存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它给予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进而揭示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思辨理路、灵性境遇和价值取向,展现出一幅真实可靠、发人深思的人类理性精神画卷。

总之,通过对管理哲学作出一个全面的学术归纳和表述,旨在回应、诠释当下中外学界普遍认为的:管理哲学的文明认知、人文诉求、道德精神、价值传承、理想愿景、信仰诠释、行为准则、审美取向等将是现今管理学发展的中枢维度和核心机理,并将引导人类管理理性精神的涅槃和嬗变,致使人、人类及其文明样式回归、皈依于人性认知“善”的意蕴。我真诚希望这一预言成真,并通过拙著尽我绵薄之力。

刘云柏

2015年4月8日

于苏州企业管理哲学研究所

# 前 言

人类对于其全部管理思辨与认知的普遍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解读及诉求,总是透过重重的世俗意境,从最一般意义上揭示、剖析人的精神图式和思辨机制,并进行形而上的表述。实际上,人类并不只是满足于一种单纯的生命延续和浅表的文化遗产,而要透彻地感悟、诠释人类精神世界所包含的中枢维度、机理进路和最终走向,这关系到人类灵魂的安顿和归宿,以及人类对其自身价值的认知正义。这就是说,当人类无法真正理解、把握上述的终极意蕴和图景,其心境、灵性、激情、勇气、毅力、创造能力就无法凸显和展开。由此,人类在其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始终如一地守望着遥远的管理精神天际线,为之不倦地追求和思考着有关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全部命题。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是指人类管理精神世界中的理性思辨、心境灵性、道德伦理、价值理路、人文诠释、审美意蕴、理想图景、信仰诉求等属性特征,以及中枢机理和基本范畴,其整体研究和论述包含着以下内容:人的先验认知及其彼岸性意蕴;理性思辨的张力及其弱点;思想、理论与学术体系的巨大支撑意义及其不完善性;各管理学派之间的争鸣、交融、比较、冲突,以及其各自的涅槃、蜕变、更始、兴衰和进退;管理意识形态、国家意志权力的历史过程和变异路径;人类文明进程与一般管理哲学的关联及影响,等等。总之,在梳理、剖析、诠释上述一系列命题内容中,将涉及的人类精神世界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其发展道路、终极轨迹、危机困境、出路前景又是什么?这些在人类生命意义和生存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它给予人类什么样的启示?进而揭示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思辨理路、灵性境遇和价值取向,展现出一幅真实可靠、前因后果、发人深思的人类理性精神画卷。

在管理学史的学术镜像中,人类最初对于管理普遍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认知是朦胧、肤浅和零星的。在上古的神话传统与原始宗教的纪实中,人类守持着恐惧、敬畏和崇拜的意境,跪拜、匍匐在一个由其自身构建的祭祀和告颂的精神偶像前,折射出人类最初的灵性意境与神本合一的清澈光彩。其间,一方面显现了人类理性思辨的迷信和困惑,另一方面,又勾勒出人类精神的质朴和纯真。



在西方,《圣经》“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开天辟地的讲述已成为千年不变的真理和信仰。在中国,《山海经》记载:最初天下茫然一片,孕育其中的盘古,以其神力开天地,天地始分,成为中国上古永恒的箴言和语境。此后,中西方理性世界均出现了拓展、纷纭和张扬的历史时期,即人们试图通过学术思辨的路径,构建起不同于神话和宗教的人类管理普遍价值和终极意义的理论模式。古希腊哲学认知的升华和嬗化,认为人类管理精神是与人类相对峙的一个彼岸性世界,并将管理精神看成是由某些基本人文或逻辑要素组成的体系。亚里士多德主张管理世界存在着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是终极性的状态取向。他指出,管理个别与管理一般有着“低贱”及“高贵”的认知差别,而这种认知差别是通过逻辑证明成立的。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所指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管理思辨理论模式,意味着人与管理世界有可能是互通和平等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个学派相互激荡和交锋,启迪人们“天问”的勇气和智慧,人们可以离开神的语境,独立地观察、思考管理价值的所在,尤其是儒、道二家,它们把管理看成是一个人性善治与无为守持的范式,其影响深远。

人类关于一般管理哲学的求索的空前活跃,在其精神现象史上却显得如此短暂和急促,很快被中世纪的精神铁幕所掩盖,基督教作为西方主流理性精神在其哲学思辨表述和管理世界本原性的诠释方面,凸显出这样的理性进路:即管理意境和走向是取决于人的原罪的救赎,而灵魂的救赎却不可预言或破解,其必然被祈祷并供奉。由此,确立了上帝在管理终极解读上的绝对权威。在中世纪末期,这种图式与日益凸显的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新兴资本主义管理精神启蒙相冲突。在中国,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将人性以“天”的名义作为精神图式,以外儒内法为思辨架构,来维系、控制世俗管理,汉儒经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学考证,将人性绑架于敬天的祭坛,曲蜷于散发着法家冷峻犀利气息的“皇权”庇护,人类管理的普遍价值和终极意义始终无法在人性认知上得到真正的张扬和伸展。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近代,弥漫、浸润于人的心境深处,造成中国一般管理哲学精神思辨范式的停滞和僵化。

14至16世纪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基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思想、人文伦理、文学艺术的回归,颠覆了中世纪神权专制的意识形态,重新点燃了人性意义的理性之火,旨在构建人类工业化精神价值体系。其间,经历了诸如英国培根和洛克的人类理性与工业精神的洗涤,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的启蒙,德国费希特、康德、谢林的精神思辨的激荡,以及路德宗教改革的铺垫,构成了近代西方独特的有关工业化价值精神诠释的理论体系。进入19世纪以后,这个理论体系的思辨价值指向,经过德国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的浸润,英国的密尔、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沉淀,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思辨的演

绎,以及美国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喧嚣,尤其是泰罗、韦伯、孔茨、西蒙的价值精神和工具理性的推动,西方所铸造的全部管理理性思辨体系,在人类文明进程上俨然代表着人类的人性原则和一般利益,貌似包含着普遍价值和终极关怀,转而成为人类工业文明样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管理理性认知。尤其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分析哲学、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人本学、新存在主义、解释学、操作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管理哲学思潮为背景,凭借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高新科技,依托人类文明进入后工业社会精神图景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原先的以国家、民族、地缘为组织单元的管理理性取向,向全球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思辨认知过渡。由此,至今西方工业化精神价值及其管理思想体系在人类精神现象史上,好像已成为具有前沿性意义的一般管理哲学形态。

然而,目前西方推崇的工业化精神价值及其思想体系,尽管有着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学术孕育、萌发、成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曾是人类管理理性思辨的一种先进样式,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地位,但是,在人类内在人性认知及其先验意象中,它是沿着人性伦理与工具理性两个不同的学术轨迹展开和延伸的,其内在包含着人性价值与操作取向之间的分裂及对抗的复杂境况。这种两难的学术构成,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工业革命及其资本主义精神内在属性的缺失和局限,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代表或科学地表述人类一般管理哲学。当下,这种分裂与对抗变本加厉,它挟持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张扬着基督教个人主义至上的信仰力量,充分利用其制度意志的冲动以及纵容高科技的无限扩展,其结果是大大放大、扩张了工具理性主义和实证哲学理论的学术容量和尺度,呈现出近乎极端的恶质化倾向,形成了经过精细包装的工业化价值理性为导向的管理理性思辨的学术氛围。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尽管在宪法哲学、国家意志和公共管理精神方面尚固守着人与正义的法理进路,并张扬着工业化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其他大多数领域早已沦陷于人的欲望深渊之中,工具理性和实证思辨作为至高无上的哲学理念已支配着整个西方管理学界。

晚近以来,面对西方强势的充满着竞争和博弈的工业化精神价值及思想体系,中国整个管理精神世界及其学术形态一直处于弱势的转型挣扎和防御退却中。综观中国管理理性思辨的进路和轨迹,其经历着一个复杂、曲折、痛苦的蜕变和涅槃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始终未能突破和成功,相反,其代谢停滞,结构陈旧,体系僵化,各要素有机组合发生整体断裂,管理理性学术信息的嬗变、交换和补偿趋向缓慢,自我保持和自我更新日益衰落。这就是说,中国管理理性思辨至今尚未真正冲破或突围西方管理思想及其哲学体系的统摄格局。今天,西方工业化价值理性前所未有地强化了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浸润和渗透,由此,非西方管理思想遭遇到亘古未有的困难,其管理理性思辨精神及其哲学思辨一直处于边

缘化的状态。同时,中国管理精神世界也经历着类似的“精神困境”,而这种困境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推进以及社会全面转型,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加之它具有巨大的系统性、思辨性、历史性的精神体系的属性特征,其内在结构异常的稳定和坚韧,因而它的变化往往比较深沉和缓慢,显现出一种“停滞”的认知倾向。

在整个人类管理精神史上,有关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学术探索和研究始终贯穿其中,只是时起时伏,若现若隐。这种存在尽管有着不同的学理纠葛和学派歧义,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纷争、压抑和钳制,国家意志及其制度哲学时常取代、占据人类管理哲学的学术空间。尤其是现今工业化竞争和博弈的加剧,物质财富的更大占有和消费主义的极端快感成为人的第一需求时,整个管理学界对于这样的学术命题一直处于漫不经心的状态。同时,尤其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它与人类日常管理行为的影响和关联是间接的、折射式的,而经常被人类所忘却,它宛如悬挂在遥远的天际线上一颗暗淡的晨星。

然而,在 21 世纪初叶,随着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管理的来临,以及西方向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步伐加快,人类文明进程跨过国家、民族、地缘的界限,形成了全方位的交融和延伸,出现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共同价值认知的全球化进路,这种全球化在文明样式上还带有胚胎式的印记,而在其理性思辨上人类似乎尚未做出完整的论证。此间,西方价值本位和利益取向利用其天然的强势地位,进行了某种转换和递补,将西方管理理性思辨诠释、解读为人类一般管理哲学,这种诠释和解读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诘难,其后果是,在现今人类管理精神境遇中有关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学术地图是分裂的、零乱的。

如上所述,人类目前对于西方管理理性思辨的学术认知和价值取向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1) 西方学者认为工业化理性精神及其管理思想体系就是人类一般管理哲学,他们坚持工具理性和实证思辨的唯一性,将科技、市场、资本、操作和消费,描述成为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而对于人性善治、生态保护、简约生活,以及精神世界的不可取代性、独立性和宗教终极关怀,时常消失在其学术视野中。

(2) 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对于西方工业化理性精神及其管理思想体系显得执著和虔诚,按照工具理性和实证思辨的价值模式,来介入本土的管理评价机制,企图在学术复制和理论粘贴中,寻找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路。

(3) 活跃于人类管理理性认知地图中间地带,弥漫着各种极端诉求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以不同的宗教派别、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通过捍卫其经典教义、

愿景、信仰,将那些固化的超时空的绝对真理进行赞扬和放大,他们基于粗糙、偏执,近似野蛮的价值取向,不惜采用恐怖活动、血腥暴力和全面战争,乃至悍然使用热核武器,来推行由他们认为的代表着人类一般管理价值取向的教义,在人类文明边缘地域不时发出叫嚣和挑衅。

(4) 在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中,析出了被称为“新左派”的组织取向,其在学理上痛斥人性的罪恶,进行单边的、僵硬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阐述,谴责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而不反封建专制主义和国家权威主义,常以国家代表自居,旨在夺取最高话语权,强调延续着原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轨迹,利用主流意识形态历史沉淀中的“左”的成分,绑架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某些困难,煽动着狭隘的政治仇恨情绪,不时地蛊惑人类的心智,鼓吹现在唯一的任务是展开全球性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5) 在人类文明样式转型中,涌动着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肯定的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定位于稳重守持的精神品格和思想意境。它解析了为填补近代世俗化和理性化潮流不断消融人性价值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空白,即凸显出一个人类自我观照、省悟各种人性失范的思辨维度。因为,人性认知本身是为人类文明进程提供的解释系统,它推崇神圣感、敬畏感和秩序感,强调现今全球化过程语境中的“保守”取向,旨在使人性意义在终极关怀诠释、证信等方面具有恒常性的理想和意义。

(6) 绿色哲学及生态价值取向,这是现今有关显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另类思辨样式。它有着对整个人类工业文明价值理路的一种颠覆性思考。它认为回归和修复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状态,是人类管理精神世界嬗变的必然结果。由于人类困囿于从哲学本位论区别人与自然的存在,主客体二元思维,致使人类一度据于自然之上,成为“万物”的主宰,肆意剥夺自然界其他物种权利。绿色哲学及生态价值取向确定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承担着自然的安宁、和谐和永恒的职责与义务。

现今学界已有人着手展开人类共同管理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一般管理哲学的研究,也进入反思整个工业化理性精神的哲学进路、价值愿景、思辨诉求,剖析人的人性本质、伦理机理、心境灵性、审美认知等人内在的构成和进路,解读在人类文明样式转型下的人的管理理性范式和精神架构,诠释人类面临的后工业社会管理图景,即一个充满人性终极意义的全球政治,一个服务于平等需要和正义互助的人类经济,一个富有人道和悲悯的、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普遍精神,一个维系人类共同价值信仰的主体构成和制度责任。尽管如此,这种学术形态和研究过程依然只是停留在人类理性认知的边缘地带,其学理体系尚未成熟和完整,还不具有与其他非一般管理哲学思潮展开公开论战的底蕴和能力,只有个别学人在

人类思辨的高地上的呐喊和呼唤。实际上,现今对于一般管理哲学的思辨理路和价值论述,还未完成体系化构建和涅槃式蜕变。

如上所述,人类理性精神没有像今天那样地凸显前所未有的贫困和呆滞,人类心境和灵性浸润在物质消费主义的快感中,出现了整体性的认知麻痹和思辨瘫痪。那些在人类意识表层跳跃着的各种理性表述和思想流派,尽管呈现出某些争论和交锋,也会演化成某个历史学术的仿真端面,但是,这些表现大多数只是由国家意识形态所衍生的一种舆论戏法。同时,这种舆论戏法的背后,时常是以柔性的福利主义为进路,旨在模糊、钝化人类认知的锐度,或者以国家意志为铺垫,乃至以剑与火的暴力场景,来控制、限定人类管理理性思辨的嬗变。

这里包括:人类如何化解、克服其管理理性思辨的学术危机;追究、探索人类理性伦理上的沉沦的深层原因;剖析、质疑工业化理性精神;强调、凸显人类共同价值及其文明一体化的历史趋向;指出、诠释人类着手构建人性善治的全球性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寻找、揭示各种改革机制和创新路径;从人性终极关怀和人文主义复兴的高度,提出可供人类设计与选择的理性图景等等。这些已成为人类至今无法回避又必须破解的课题。它不但关系到人类管理文明的走向和兴衰,而且,影响着人类管理精神世界的涅槃、复兴和嬗变。为此,任何沉迷于物质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思辨倾向,贬低、敌视人类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解构、阻挡人类理性精神有关普遍价值和共同伦理的研究和探索,其结果必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必须看到,人类面临如此艰难、复杂的学术生态和心智,并不是永远无法克服和破论的。如果人类真正沿着人性普遍意义的切线,对于其自身认知体系进行全面蜕化、涅槃和嬗变,重构人类虚怀、敬畏、战兢、宽容、悲悯的心境,从人与自然这两个最基本的价值理路出发,放弃对自然的侵占和吞并,反省对于人性的碾压和践踏,那么,在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歧义丛生、认知偏执、思辨单边、暴力至上等学术取向将会顷刻瓦解,人类有可能站在其文明走向的大尺度战略高度,来思考、探索和研究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学术体系。其中包括:人类管理普遍图景与一般管理哲学;人类一般管理哲学基本原理、范畴,以及对非普遍价值思潮的批判;主体理性思辨的中枢维度和内在机理;在意识形态张力上的争论与交锋;人类认知的困顿、失足的深层原因;人与自然、经济与企业;民族、国家与公共管理;地缘组织范式;全球化与全球管理;人在宇空中的管理理性守望;学术构建的路径、方向、方式、机制、目标、终极意义和主体责任等等。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研究和构建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衰落与更新的多元相互过程,其间,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学术发展图式和价值表述机制,任何强制或僵化的学术思辨行为,均与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真理意义和正义指向相违背。



实际上,学术认知逻辑、学派沿革分类、理性思辨方式、整个学术研究架构及体系,尤其是边界与范畴、发展方向与终极目标、中枢维度与内在机理、研究具体领域与时空尺度、新人文主义复兴与启蒙等方面,也会随着人类内在心境和灵性的顿悟、涅槃和回归,以及其新知更始、精神历练、意义守持的不断深化而发生相应的变换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研究和构建,取决于人类自身精神理性的先验认知启示、思辨涅槃自觉和理性变革责任。

如果从人类管理精神现象史的彼岸性意蕴,以及其思辨进路、价值分析、理想诠释、信仰皈依等方面作出解读和剖析,那么,不难看出,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学术形态的孕育、萌发、蜕变、嬗化和发展,表现为以下基本机理节点:(1)在人类管理精神理性特有的认知架构中,人类生命过程和生存意义所构成的人性认知“善”的普遍诉求,是人类一般管理哲学具有决定意义的中枢维度和核心理路,它是解构、颠覆一切非人文管理思潮的根本动因,并支配、统摄人类理性精神的嬗变正义。(2)工业化价值理性的意义诠释、真理证信、组织理性、嬗变进路、心境意境、愿景追求等,均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工具理性和实证经验体系。这个体系既包含契约精神、宪法哲学、个性解放、公共管理等人类一般管理的属性特征,又带有利润精算、过度竞争、极端消费、人与自然对立等消极成分。这种两重取向使其利用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既成格局,进行自我变异和伪装,以此变换、充当一般管理哲学,旨在成为符合工业化理性精神的一般管理哲学机制和准则。(3)在人类精神理性思辨的复杂谱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远离于文明大道的极端性思潮和理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反对人性认知“善”的诉求和一切人本主义的思考,否定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立人格意义和先验认知本位,坚持暴力、极权、恐怖、管制,强调其意识形态的思辨价值、理想图景和信仰守持的民本意蕴及历史规律,并在管理学意义上自我证信,为其构建一般管理哲学的永恒意蕴。

实际上,在广义的人性认知及其先验意境中,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研究和构建,不但表述了人类文明样式转型所勾勒出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演化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而且,也凸显了人类管理理性思辨的自我蜕化和嬗变,在更高的人文价值层级上张扬,以呼唤人性认知的“善”的诉求。至今,有关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命题取向、对象范畴、逻辑结构、机理进路、评判机制、框架体系等,学界一直存在着争鸣,不同学术范式和思辨主旨,尽管均自证为包含着人类管理思辨的一般取向,但是,由于它们对于人性认知及其理性图景的差异,构成了人类一般管理哲学从愚昧走向文明,其不同机理性节点的交融、蜕变、断裂、对抗、回归和升华的历史过程。

今天,在广义的人性认知视觉的先验意境中,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研究和构建,中国正处于学术图式的式微、沉沦、变幻、激荡、交锋的中心。究其原因:

(1)中国管理哲学过于凝滞而缺乏活性,尤其是在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普遍价值和终极意义上,长期以来学术探索和理性思辨近乎空白,对于其整个管理精神世界的变革、涅槃的引导、激励、推动缺少新质的人文思辨的维度和机理。(2)中国管理哲学学术理路需要从西方管理思想体系中去借鉴、吸收,融合一切先进的、合理的理性思辨成分和内容,但又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工业化价值精神与工具理性实证经验的侵蚀和渗透。(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其哲学体系固有的内在特质和属性要素,使之承担起对于西方工业化价值理性及其管理哲学思潮的补充、融合、修复和发展的责任。因此,一方面中国管理哲学面临着艰难、曲折的学术转型和变革,另一方面,它对于这场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研究和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十分漫长而又成熟的农业社会,儒家和道家所代表的“天人合一”和自然中心主义的管理哲学,以及传统的日常管理结构和图式,塑造了中国民众敬畏天地、倚重自然、延续风俗,以及封建宗法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自发的管理精神思辨。同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封建专制极权管理意识形态占据、取代着中国管理哲学的价值图景。19世纪以后的这种管理意识形态随着儒、道管理学说的衰落,以及西学东渐,其价值构成不断地出现收缩和内卷化的倾向,这是出于对其内在思想认知解体的阻遏和对外在异质精神理性的防御的本能反应,并致使其内核和外壳均变得十分强硬。当西方工业化价值理性在中国本土的渗透和侵入中,其思辨重锤击碎了坚硬的中国管理精神体系,人们跨出这个管理精神体系向外看到的是: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已十分成熟,正向全球化、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过渡,工业社会的管理价值理念迅速式微和衰落,人类管理思辨企图对后工业社会的理性精神进行全面解读和诠释。这意味着中国只能在这双重管理文明及其理性思辨图式的冲突和交融上来介入、参与、构思其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研究和构建。它一方面应当成为中国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所要求的一般管理哲学的学术进路和思辨机理,另一方面,又有努力克服其工业化进程的困顿与发展的两难纠葛,成为人的管理理性精神涅槃、蜕化、嬗变更始的认知枢纽和价值向度。

由此可见,如果撇开国家、民族、地缘的理性精神和人文思辨的差别,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学术取向是:揭示人内在心境和灵性的先验诉求和彼岸性意蕴,凸显人性认知“善”的普遍价值;维系、支撑人类生命、生存的终极意义;构建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确立人本主义的崇高理想。

鉴于此,应在广义的人性认知和先验镜像中,大力开拓人类一般管理哲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科领域,剖析人的一般管理理性思辨及终极价值选择的发生机制、基本原理、对象范畴、理性层级、历史时空、嬗变轨迹和意义准则,诠释

人类管理文明史以及人类学术视野的比较研究和人性本质的还原,剖析人的理性精神的衰落、蜕变、自新、转型的内在联系与嬗变、涅槃、变革、创新的展开路径,消除、净化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沉淀的工具理性和逻辑实证的意识偏差。即在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对整个人类管理理性思辨及学术体系进行反思和重估,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人本本位和人性坐标,推动人类认知从傲睨自若的工具理性和实证经验转向虚怀若谷的人文价值理想,从粗俗狂热的物质拜物教转向简约自律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历史走向上思考人类一般管理哲学所蕴含、守持的人类总体利益和价值回归,比任何以往人类的管理理性思辨形态,更具有一般人性认知的善治境遇与人类广义的终极关怀,这与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的自我肯定价值取向和东方专制体制下的极权主义哲学理性,是完全不同的管理理性精神意蕴。

总之,从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广义价值视野出发,人类管理理性思辨的哲学认知范式、维度、机理、理想和信仰,与人类文明进行样式的变迁、更迭、蜕变和嬗新是同步的、一致的。它们似乎均是从共同的历史特定初始基点出发,诉求、描绘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其内在精神世界的关联,以及其演绎、涅槃、更始、延伸的理性进路和轨迹走向。尽管它们在表述方法、主体角色、实现路径、话语形态、信仰诠释、机遇选择等方面不尽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在历史方向、意义确认、行为机制、利益格局、终极价值、精神意境等方面却有着无法分割的关联。人类对于一般管理哲学的顿悟和认知思辨深度,均必须通过其自身的人性本位和人格责任来实现,这些将显现出人类无与伦比的伟大品格和崇高理想,以及克服人性缺陷的智慧和弥补理性偏执的勇气。这也正是人类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理由和希望。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前言 .....                                   | 1  |
| 绪论 .....                                   | 1  |
| 第一节 人类管理普遍图景与“管理哲学”一般 .....                | 2  |
| 一、人类内在人性认知具有先验、普遍和共同的终极皈依 .....            | 2  |
| 二、人类管理普遍图景是一般管理哲学的中枢维度 .....               | 5  |
| 三、一般管理哲学的认知形态和机理进路 .....                   | 8  |
| 第二节 一般管理哲学与管理思想史 .....                     | 11 |
| 一、管理思想史在某一非常重要方面支撑、维系着人类管理理性<br>思辨体系 ..... | 12 |
| 二、人类管理思辨对于其理性精神历史意蕴的“路径依赖” .....           | 15 |
| 三、一般管理哲学皈依于管理思想史的蜕变和守持 .....               | 18 |
| 第三节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与现当代 .....                     | 20 |
| 一、工业文明的衰落与新人文主义的复兴 .....                   | 21 |
| 二、全球化及大数据时代与人类认知的涅槃和嬗变 .....               | 24 |
| 三、人类一般管理哲学的高尚伦理精神及其美学含量的思辨<br>图式 .....     | 28 |
| 第一章 人类一般管理哲学基本原理(一) .....                  | 32 |
| 第一节 肯定自然优先于人的价值法则 .....                    | 33 |
| 一、人只是自然体系的一部分,不具有可以超越自然的任何<br>能力与意志 .....  | 33 |
| 二、人不能创造或消灭自然,也不能复制、肢解或支配、取代<br>自然 .....    | 36 |